

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

江宁康 著

NINGKANG JIANG

LITERATURE &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美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而“文化共建”在当代美利坚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意义。

只要美国还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似乎永远没有终结的答案；但是，只要美国文学创作中民族叙述的母题如“美国梦寻”、“族群寻根”和“文化认同”等仍然具有生命力，美国的各族作家将继续以文学想象来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资金资助

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

LITERATURE &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INGKANG JIANG

江宁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 / 江宁康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305 - 05210 - 1

I. 美… II. 江… III. 当代文学—关系—民族性—研
究—美国 IV. I712.065 C95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743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
著 者 江宁康
责任编辑 施 敏 编辑热线 025 - 8359602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5.25 字数 363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978 - 7 - 305 - 05210 - 1
定 价 4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前言

1998 年秋,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选修了政府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教授的一门课“民族与民族主义”,每周进行两次集中研讨。我选修这门课既是论文撰写的需要,也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虽然课程阅读量很大,考试要求很严,但我至今仍然觉得获益匪浅。起初,我只知道本·安德森教授是国际政治学领域里研究民族主义和东南亚问题的权威,却不知他小时在中国云南住过,他父亲在二十世纪初任过云南海关的外籍官员,而他与当代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又是兄弟。熟知多种语言的本·安德森教授在二十世纪中期因为研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问题而批评了当时的军政府,所以在 1972 年被苏哈托驱逐出境。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他在美国通过阅读印尼的几部原文民族文学经典来研究印尼的民族主义起源和文化认同等问题,并发表了《语言与权力》和《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等论著。后来,他又以《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而著称于世,每年慕名到伊萨卡来求教的学者和专家络绎不绝。他的这门课是博士班研讨课,班上同学来自世界各地,二十几位学生常在课上各抒己见,而本·安德森教授则不时插话给予指点,我从中也学到了如何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族形象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等许多有意思的问题。2002 年我学成回国后,看到国内学界在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等问题上都在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的论争此起彼伏,因此一直想在这方面写点东西。本书《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也算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学术参与吧。

如果说,这本书属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政治之间的一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话,那么我首先要感谢本·安德森教授当年所传授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其次,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国家“985 工程”的南京大学“汉语言

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的资助和外国语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所以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本书深入讨论了十几位美国当代作家的新创之作,有些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而被我直接引用,另外书里也使用了一些原版照片或图表,我对这些国外作者也表示诚恳的谢意。我还要对所有中文引文涉及到的众多国内著、译者表示衷心感谢,他们的论著和译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最后,我要对本书的责任编辑施敏表示敬意,她的细致编校和认真工作保证了本书的出版质量。本书在体例上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的四章内容注重梳理文学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及进行理论问题的探讨,后半部分四章内容分别研究了美国当代各族裔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及有关民族认同等方面的艺术表现等问题,书后还附有“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当代族裔作家和作品列表。本书引用的一些原文论著反映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2000年以来出版的英文论著被引用五十余种。因此,本书既可作为当代美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参考书,也可作为深入认识当代美国民族问题和文化矛盾的参考书。由于本书撰写时间较紧,其中疏漏舛误有所不免,所以我十分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和所有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笔者今后修改,并在此预先致谢。

江宁康 识

2007年12月

导言：文学想象与民族认同

来呀，我要创造出不可分离的大陆，
我要创造出太阳所照耀过的最光辉的民族。

——W. 惠特曼：《草叶集·为你，啊，民主哟！》

世界上每一个现存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组成，是民族国家形成主体文化传统的关键因素，是构成民族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民族与文化这两者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生现象，它们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其文化的历史，它们都是产生于民族建构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运动之中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文化传统的支撑，而文化的传承和更新也需要民族主体的保障。正如钱穆指出的：“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① 坚持文化与民族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的观念对我们认识当代单一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也是民族文化独立的建构过程，所以现代欧洲社会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把文化视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有力武器。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以文化的相同性作为基本的社会纽带。”^② 这就是说，人们在一个共同的地域疆界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价

① 钱穆：《民族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页。

② Ernest Gellner, *National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 p. 3.

值观念、共同的历史记忆,甚至是共同的崇拜偶像等等都具有比共同的种族特征(肤色、毛发、五官、身材、头颅结构和眼睛颜色等)更为重要的民族认同的意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各个民族初创时期的民族特性常常是通过先民的想象而表现在原始艺术或部落歌谣之中,这些文学艺术的早期表现以后又逐渐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创始神话、英雄史诗或民间传说等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民族文学的发展是从原始的、粗犷的和朴素的表现逐渐形成以若干经典作品为核心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轨迹也是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样的,文学创作的经典之作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由民族群体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长久的集体选择所产生的,文学与民族因此是难以分离的。不论那些神话故事、英雄史诗或民间传说是口头文学还是书写文学,它们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不仅在于具有提炼民族语言和体现审美理想的功能,更具有传承本民族核心价值观念和社会风俗模式的功能。所以,民族文化认同与本民族的文学创作是密切联系的,文学形象的接受、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学语言的普及也都存在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过程之中。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作为帝国和王权的对立面而兴起的,它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的开始,而且也标志着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开始。民族成为“想象的共同体”是在有关古代国家的各种神圣观念被解魅之后,即在“绝对真理”、“救世主”或“天命王权”等观念不再被当作控制人们的思想武器之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帝国王权的解体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如罗马帝国的解体和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如此。按照 B. 安德森的看法,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由于市民文化的发展,面向大众的小说和报纸借助“印刷资本主义”的扩展而担负起了建立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重任。^① 换句话说,文学和传媒在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国家建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是把分散的个体联系起来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 页。



的一种文化纽带。不论从原始文化艺术的发展来看还是从近代民族文化建构的过程来看,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都是有机的、持久的和动态的。西方文学史可以说明,文学与民族认同之间持久的有机联系和动态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文学具有民族认同的重要功能;文学是民族-国家影响力兴衰的重要领域。这三方面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西方文化史上,从中世纪开始的建构民族国家的初始阶段,文学就是民族文化形成的核心内容之一。特别是那些后来成为民族文学经典的作品,它们能够最大程度地、生动而具体地把本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审美想象表现出来,在文学形象中体现本民族的基本特性和民族的思想方式。所以说,民族文化的建立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只有文学经典作品才能真正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各民族文化初创的时期,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往往是以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而早期的文学如神话和史诗等等就担负了用形象塑造民族英雄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的任务。在西方文化史上,意大利的维柯(1669—1744)和德国的赫尔德(1744—1830)等人是系统研究民族文化和民族发展之间关系的先驱者,他们把民族文化视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认为民族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创新是不可分割的。维柯在深入研究了荷马史诗后指出:“这些诗的人物性格必然符合全民族的思想方式,他们在极端野蛮的时代,按照本性的必然规律,不得不采取这种思想方式。”^①确实,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如专制的大神宙斯及其众神家族表现了当时父权氏族社会的等级制和天命观;而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完成的十二件伟业则体现了氏族部落先民们的社会理想和英雄崇拜。文学人物形象还常常表现出民族文化的一些特性,正如古希腊人对智慧的赞赏不仅反映在对雅典学园里哲学家们的推崇上,而且还生动地体现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塞和民间传说中的智者伊索等人物形象上。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是传承该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其作品所表现的艺

① 伍鑫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页。

术形象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因此,文学大师与经典作品就成为民族文化传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缺少伟大的文学成就的民族文化也将是空洞的和苍白的。

由于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因此文学就具有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而这种功能往往体现在文学想象与民族文化之间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上。民族文化的传承需要文学创作的形象性表现,文学创作的繁荣也需要民族文化的长期滋养。对每一个现存的民族群体来说,其文化是由历史传承下来的、具有活力的生存之道;这种生存之道不仅在历代沿革中被制度化和礼仪化,而且在文化表述中被形象化和经典化。于是,传承和建构就成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运行方式,而在这个传承与建构的过程中,民族文学经典担当了传播和提炼这些形象的重要任务,接受、欣赏和认同这些用本民族语言表现的艺术形象也就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具体实践。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民在接受民族文学形象的过程时也会通过想象形成民族的集体记忆,并被他们共同信奉的某些价值观念联系起来,于是这些文化形象就成了民族认同的象征和标志。所以说,民族认同需要文化认同的基础,而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民族文学所塑造的各种民族身份和族群形象加以认同。历史上常见到各个民族文化传统由于本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而被发掘、塑造并传播开来,民族特性和文学叙述因而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C. 卡纳运用 B. 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来解说当代民族认同的矛盾时指出,民族、种族和族群都是“广泛地联系着文化、祖先、集体记忆、历史和语言等因素……具有划分疆界和集合群体成员的倾向。而这也是政治性的文化实践”^①。民族形成和文学叙述的有机联系在西方文学史上有许多先例,民族文学经典的形成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建构具有共生共建的相互依存性。例如,诞生于公元七、八世纪并流传至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以及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英雄史诗如法国的《罗兰之歌》(c 1080)、西班牙的《熙德之歌》(1140)和德

^① Christian Karner, *Ethnicity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7.



国的《尼伯龙根之歌》(c.1200)等等,它们都为在欧洲建立各自的独立王国以及后来的民族国家奠定了文化和语言的基础。随着民族国家发展壮大,各民族都涌现了一些伟大的文学家和不朽的作品,这些经典作家与作品就成了民族国家文化传统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意大利的彼特拉克、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歌德以及俄国的普希金等西方经典作家都为本民族留下了传世的不朽之作,标志了这些国家民族文化的成熟和艺术成就的高峰。歌德的《浮士德》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它塑造了一位历经五次人生悲剧却仍然执著追求完美的人物形象——浮士德,这个形象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气质的生动表述: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精神,同时也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具体而伟大的象征。事实上,阅读文学经典作品是一种陶冶共同民族性格的过程,是培育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也是进行民族认同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于是,文学经典和艺术形象的传承就不仅具有审美创造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有延续民族文化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意义。

最后,文学的兴衰也是民族实力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在世界现代历史上尤其突出。尽管中国历史上常有“国家不幸诗家兴”的时期,但是从世界文化交往的历史上看,落后和衰弱的民族往往只能接受他者文化的影响而无法输出自己的文化艺术。一个民族的强大如果不是昙花一现,那么它的文学繁荣期迟早也会到来,它的文化影响力也会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它的文化软实力也将得到增强。实际上,西方文化史上的文学兴盛时期多数是与民族或国家的繁荣同步步的。例如,古希腊雅典时期的悲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诗歌,以及英国工业革命后期的小说等等都反映了文学兴衰与民族兴衰的同步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民族国家的繁荣时期常常也是民族文学经典作品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时期,而文学繁荣也对丰富民族文化、提高民族影响力具有重大的作用。中国唐代诗歌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一个例证,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则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B.安德森指出,英国的莎士比亚当时是以本土方言写作的,所以他的戏剧在法国一度默默无闻;只是由于大英帝国国家实力的日益强大,因而经过了二百余年,莎士比亚的戏剧才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

财富。^①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在五百年前的世界影响力并不大,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西方文化的今日是不可想象的。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民族形象的文化建构,尤其是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塑造民族特性的代表性人物和形象,是各民族国家提高自己文化实力的需要,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从而维护本国民族团结的需要。正如二十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不仅被视为一项重大的文学成就,而且被当作一种重大的民族荣誉那样,各民族国家在提升自己国际影响力的时候都不会对本国的文学创作视而不见。W. 米歇尔指出,文化形象的塑造一旦与民族历史和价值观结合起来,它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和代表性,因为“形象并不仅仅是一种特别的符号,而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位演员”^②。各国文学艺术的经典作品正是为这位演员提供了优秀的演出剧本。事实上,历史上各时代的各民族都会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加强民族的认同,并让这些形象在不同的程度上成为民族身份的代表。例如美国诗人惠特曼所塑造的那种个性张扬的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形象,以及美国西部文学和大众文化表述中的“牛仔”形象等等。民族文化的一些代表形象常常是长期历史建构的结果,例如,美国牛仔的原型只是早年西进运动中一些农牧民的代表,但是由于大众媒体持续不断地塑造而使这种形象浪漫化了,以至成了美国特性中开拓冒险精神的一种象征,甚至成了美国消费文化在全球扩张的一个典型形象,正如美国万宝路香烟的品牌图案和广告中的“西部牛仔”形象所表明的那样。总之,民族、想象和叙述(nation, imagination, narration)的关系是密切的,文学想象的创新和作品的繁荣是民族文化兴盛的标志,也是民族国家文化实力的具体表现。自古以来,强大的民族保持自己在世界上持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事业的发达,使本民族文学形象进入其他民族的想象空间,从而使民族文化身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因此,以优秀的文学经典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建构是一项“经国之大业”,是提升民族国家文化实力的一项基本任务。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② W. J. T. Mitchell, *Icon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9.



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虽然复杂,但是从民族文化的组成、民族认同的功能和民族实力的标志等三个方面来看,想象性的文学创作对维护民族认同和保持文化活力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这个认识对理解美国文学,特别是理解当代美国文学也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因为美国的建国历程与其民族文学的建立和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美国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形象不管是在早期文学经典作品中还是在当代文学中都得到了多方面的表现。由于现代美国的民族文化几乎是与摆脱欧洲影响的文化独立进程是一致的,所以那些创作了本土文学和民族形象的作家也就是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建设者。这正如 R. 利汉所指出的:“美国的文化价值与文学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认识的最深层来看,两者之间是相互加强和互相循环的关系。我们的民族形象就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①不过,这个“民族形象”在美国文学史的形成过程中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特别是在早期部落文明阶段表现了原始文明的悠久和古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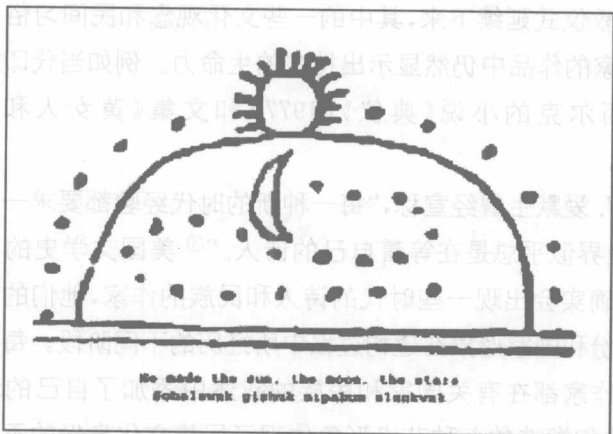


图-1: 北美印第安人的早期创世岩画 *Walum Olum* 之一:“他使万物运转如斯”

从北美洲历史发展轨迹上看,美国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历史。大约一万五千年以前,亚洲北部的游牧部落艾努人(Ainu)和尧蒙

^① 卢瑟·S. 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龙治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人(Jomon)穿过伯令海峡来到北美大陆,然后逐渐向南美大陆迁徙,最终成为本土美洲人或印第安人的祖先。DNA 检测显示,艾努人在亚洲的后裔目前仍有极少数居住在日本北部,成了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民族,而尧蒙人在亚洲已经没有后裔,他们的 DNA 仍然存留在今日的切诺基(Cherokee)、布莱克福特(Blackfoot)和西苏克斯(Sioux)等印第安部落人群的后裔中。^①所以说,本土印第安人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移民,他们是从亚洲北部向北美和中、南美流动的移民。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美国境内亚利桑那河谷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村落,而在今日凤凰城附近则逐渐出现了霍霍坎人居住区以及他们修建的金字塔形土墩和开掘的运河。在今日俄亥俄南部仍然留存着几千个这样的土墩,这些土墩最早的建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可能是作为墓地或宗教仪式的场所。公元九世纪左右,科罗拉多地区出现了许多印第安霍皮族人祖先修建的城堡,而在新墨西哥地区的普韦布洛(Pueblo)城堡遗址上竟然有八百多个居室。^②这些地区的印第安部落文化一直没有灭绝,而是依靠口头文化或宗教仪式延续下来,其中的一些文化观念和民间习俗在当代印第安裔作家的作品中仍然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例如当代印第安裔女作家 L. 西尔克的小说《典仪》(1977)和文集《黄女人和美女神》(1996)等。

R. W. 爱默生曾经宣称,“每一种新的时代经验都要求一种新的表述,这个世界似乎总是在等着自己的诗人。”^③美国文学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也确实会出现一些时代的诗人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标志了民族身份和国家形象在建构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每一个时代的诗人或作家都在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叙述中添加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因此他们塑造的各种艺术形象体现了民族文化身份的不同侧面或

① Joseph R. Conlin, *The American Past*, Vol. 1, 7th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2004, pp. 1—2.

② Howard Cincotta, ed., *An Outline of American History*, US Information Agency, 1994, pp. 7—9.

③ Paul Lauter, ed.,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nd edition,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p. xxx.



时代特征。正是由于许多著名作家持续地对美利坚民族形象进行了创新性艺术塑造,这些形象随着作品的流传而构成了一系列“美国身份”的画廊。由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这些系列形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和更新的文化身份谱系,并反映在追溯民族文化起源的问题上,例如美国当代文学对古老印第安文明的追溯和再现等等。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近几十年来,美国文明史正在积极继承美洲文明的悠久传统,实现从欧洲本位向美洲本土的转化,把“老欧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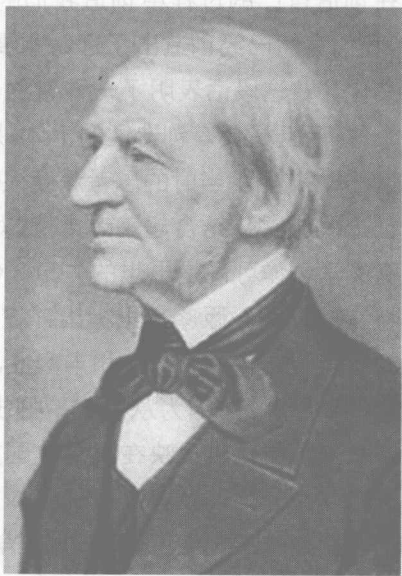


图-2: 主张建构民族独立文化的美国
思想家和散文家 R. W.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新世界”的民族文化身份区分开来。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又一次美国文化独立运动,是重写美国历史的必然需要,这将把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历史延伸几千年,彻底改变由十七世纪初殖民主义者所撰写的美国文化及文学的欧洲从属史。美国当代文学创作已经并还在积极投入到这种身份转化的建构之中,许多著名作家和族裔作家新秀的艺术作品正在改变着人们对美国文化特性和美国文学历史的陈旧看法,正在重建着美利坚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

从美国当代的社会文化演变来看,这种新的民族身份建构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少数族裔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六十年代的学生反战运动和造反运动等重大社会事件有直接的关联。这些社会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学创作中民族身份意识的高涨,黑人作家 R. 艾里森在小说《看不见的人》(1952)中借人物之口说的一段话很有深度:“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变成一个个的个体。一个种族的良心就是那个种族的个体有才能观察一切、评价一切、记录一切……我

他们在创造自己的过程中创造我们的种族,到后来,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已经创造出了远为重要得多的东西:我们已经造就了一种文化。”^①这段话表明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自我不仅仅是单纯的独立个体,而且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是造就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的积极力量。R. 艾里森当时的思考深度很值得赞扬,因为他把追求种族平等与创造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考虑,这对后来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和族裔文学创作可说是思想的先声。《西斯美国文学选集》的总主编 P. 劳特在该书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学者们认识到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于是开始寻找大量湮没、遗忘或被压制的文学作品,因为从中被挖掘出来的作品生动地体现了那种多样性。”^②这种转化也反映在重写美国文学史的努力之中,一些重要的文学选集或文学史开始把美洲本土文化和欧洲殖民文化都放在同一个“美国文学”的架构之中,从而为文学想象中的美国认同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谱系。于是,白人和非白人、土著和移民都在重写的文学史中找到了自己共同的文化起源,美利坚民族文化认同的大业就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得到了崭新而生动的实施,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了。

当代重写美国文学史的实践不仅是文学研究的一项新进展,而且是重新认识美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一个新发展。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欧洲起源与本土起源的共存或分离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从民族认同的角度上说,这是当代多元文化主义从社会思潮到文化思潮、再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建构将会把“美国”和“美利坚民族”的本土渊源和外来因素以文学经典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因此形成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研究界对美国文学史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尤其是在对待美国革命前的文学传统的认识上显示了重大的发展。1984 年

① 拉·艾里森:《看不见的人》,任绍曾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1 页。

② Paul Lauter, ed.,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nd edition,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p. xxxi.



出版的《美国文学》(麦克米兰文学系列丛书)就立意要为学生“描绘一幅美国文化的独特而多样的生动图像”,并把早期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化艺术称为“与这块土地共生的美国经验”。^①后来新编撰的《西斯美国文学选集》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等大部头著作也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和氏族时期的原始绘画等都当作美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显示了美国学者们对本土文化源头的关注。这种转化是当代学界对文学现状不满并力图寻找新的艺术生机的一种努力,这在西方文化史上绝非鲜见。正如 E. 霍布斯鲍姆在研究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时注意到的:“事实上,重新发现民俗传统,将民俗传统转化为‘民族传统’,并使久被历史遗忘的乡民跃居为民族主体的,多半都是(外来)统治阶级或上层精英。”^②当然,从民间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资源在不同领域里的表现是不同的,而美国学者们从本土民间文化中寻找民族传统的活力,这既是重新勘定民族文化身份的努力,也是更新人们对美国文学传统疆界的一种尝试。这种现象反映了民族文学与民族认同的良性互动,也表现了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这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强化民族认同的必然需要,也是美国当代社会矛盾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必然反映。

首先,这是美国文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趋势。以美国革命后的文学作为民族文学断代的传统做法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为民族国家的文学主体是以“吾土吾民”作为表现对象的;而一旦确认外来的(欧洲)文学传统是美国文学的渊源,那将对美国本土文化的合法性形成挑战,将对“美国文学”本身的合法性形成威胁,甚至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合法性产生威胁。爱默生(1803—1882)指出,“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在书中抛弃传统与地域的影响。”^③艺术批评家丹纳(1828—1893)也指出,文艺发展受制于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大因素,

① Macmillan Literature Series, *American Literature*, California: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1987, p. I, and p. 1.

②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页。

③ 爱默生:《不朽的声音》,张世飞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 页。

“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顽强而巨大的压力，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着作用，使这一集体中从个别到一般，都受到这种作用的陶冶和塑造”^①。如果说，本土文学的地理因素显然在印第安文学艺术中得到了最早的体现，那么，借助描写本土文化而创建了“美国文学”的美国文学之父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印第安文学艺术的同源性。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美国文学近三百年的历史与中国文学三千余年的历史比较一下的话，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由“欧洲文学源头”所生成的美国文学视为美利坚近三千年文学文化史（从印第安人的原始岩画史诗开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断裂——从殖民地文学开始的欧洲文化影响延续到当代多元文化的兴起——只不过如古希腊文化的断裂一样，即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克里特文明的毁灭到公元前八世纪开始的希腊古典时期之间的“荷马时代”那样一种文化蒙昧期。在这段时期内，民间社会（部落社会）中流行的创世神话、英雄传说、寓言故事、及谚语歌谣等等都是民族文化形成或复兴的鲜活源泉，对塑造民族文化特性（身份）起着意义深远的作用。P. 劳特在《西斯美国文学选集》中编选了许多早期印第安人部落的口头诗歌如“猎鹿歌”、“梦歌”和“战歌”等等，这些诗歌充分显示了印第安早期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

我们还要看到，当代美国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创新上已经达到了引领世界文学潮流的高度，战后许多的美国作家作品已经成为了当代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艺术审美形式的创新上，美国作家在很大的范围内起到了文学先锋派的作用，而且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就显示出一种集体的创新能力并至今不衰。例如，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1957）、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E. 阿尔比的戏剧《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1962）、T. 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1970）、J. 巴思的中篇小说《喀迈拉》（1971）和 R. 布莱的散文诗集《牵牛花》（1975）等作品有力地显示了美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创新性，而美国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创作更是巩固了“美国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如何使美国文学继续发展

① 伍鑫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9页。